

旧闻拾遗

提起南京大屠杀，世人皆知；提起《拉贝日记》，家喻户晓。可拉贝与山东的一段渊源，却鲜为人知。正因为七七事变，让拉贝与胶济铁路产生“交集”。这段几经辗转、颠沛流离、凄风苦雨的漫漫旅程，让拉贝颇多感慨：“和平时期坐火车只需40个小时的行程，可是这次我花了10天半时间。”

拉贝的山东之行

□ 于建勇

拉贝，尽管是一名纳粹党员，但丝毫不影响中国人民对他的崇高敬意，他被誉为“中国的辛德劳”。

就是他，在“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前夕，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在他自己的住宅和小花园里，也挤进了600多名中国难民，受到保护”。（《拉贝日记》序言，胡绳）

错估形势 拉贝受阻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被南京难民视为“活菩萨”的拉贝。

约翰·拉贝(John Rabe, 1882年—1950年)，德国汉堡人。1908年8月18日来到北京，在一家德国商店当售货员。次年10月25日与女友朵拉在北京结婚。1911年，应聘到德国西门子驻北京分公司做会计兼文书，后担任北京分公司经理，天津分公司经理。1931年11月，出任南京分公司经理。

对于七七事变，拉贝一开始不以为然：“1937年夏季在北平郊区卢沟桥发生所谓的‘中日摩擦’时，在南京的我们曾认为，这起发生在北方的小小的事件会在当地加以调停解决的。”（《拉贝日记》，以下若无特别标注，均引述于此）

可是，拉贝错了。正因为不以为然，所以拉贝还是决定到北戴河避暑。妻子朵拉已经于6月份先期到达。

拉贝原计划经津浦铁路北上，不料因7月30日天津沦陷，只能乘坐开滦煤矿管理局的一艘轮船去了秦皇岛。

尽管拉贝在秦皇岛很愉快，可好景不长。当时秦皇岛已被日军占领，“不断有运送军队的火车驶向天津，每列火车都架有高射火炮”。这让拉贝有些紧张：“情况看来要比我估计得严重得多！”

在北戴河，人们对日军早已占领此地似乎没什么感觉，但空气有些紧张，它促使拉贝立刻在秦皇岛预订返回上海的飞机票，回答却是：“两个月内的机票已售完。”

正当拉贝考虑怎样才能尽快返回的时候，又传来消息，上海也受到了日本人的进攻。这就是八一三事变。

8月13日，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中国军队发动全线进攻，中国守军当即予以猛烈反击。八一三事变从此爆发，淞沪会战由此开始。8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

这让拉贝有些心慌：“眼下已不能指望经上海港返回了。这使我不知如何是好，而此后又逐渐传来消息说，日本飞机已经袭击南京。”

8月15日，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南京。8月19日，

再度空袭南京。8月27日，再次空袭南京。据次日《申报》报道，27日这天，全市房屋被炸毁500余间，“无辜平民被炸毙、焚毙者数百人”。

拉贝坐不住了：“这时我醒悟到了形势的严重性。现在就只有从天津经海上去烟台或青岛，再从那儿坐胶济铁路的火车经过济南回南京。”于是，拉贝便与胶济铁路产生了“交集”。

涉险南下 风雨相随

涉险南下，赶赴战区，无疑是一种冒险。但拉贝不那么看：

“我从比较安全的北戴河回到这里来不是出于冒险的兴趣，而首先是为了保护我的财产，为了代表西门子洋行的利益。当然洋行不会期待（也决不会这么做）我为洋行而被打死在这里。我绝对不想为了任何东西（洋行的或是我自己的一些破东西）轻率地去拿我的生命冒险。”

话说得很实在。8月28日凌晨，拉贝在夜幕下告别妻子，约15个小时后到达天津。

对于天津，拉贝并不陌生，他曾在此生活了6年（1925年—1931年）。他在南京工作期间，他的家属一直住在天津，他的女儿在天津结婚，外孙也出生在天津。

天津好友给拉贝搞到一张英国海轮船票。让拉贝颇感惊讶的是：

“这艘轮船连烟窗边上都挤满了中国难民。我正好还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了战争在天津造成的破坏，其中有一个我们花了很大精力建造起来的自动电话局被损坏就证实了这一点。街道上设置了铁丝网路障，但每处日本兵都让我们德国人顺利通行。”

看来，日本当时对德国网开一面。无怪乎后来拉贝为使安全区免受空袭，亮出的是一面大大的纳粹旗帜，居然还挺管用。

本来逃难就够受的了，可老天偏偏不开眼，又下起了倾盆大雨。这似乎预示着：逃难之路，充满凄风苦雨。

“在倾盆大雨中，一只小小的拖轮拖着两只挤满了逃难的中国人的小船。从白河（译注：当指海河）向下游驶去，数小时后才到达大沽。那里，那艘应该送我们去烟台的轮船一下子上拥上了许多中国难民，我在拥挤中一度丢失了行李，后来用了很长时间才找到。除此以外，一路上再没有发生什么事。”

貌似一路平安，其实不然。

“在烟台，下船时又下起了倾盆大雨，爬过几道铁丝网路障后，这好不容易找到了一辆送我到旅行社的人力车。这时已是黄昏时分，我把人力车顶篷推到底上，以便看一眼我冒冒失失来到这个地方。”

想必，拉贝当时的心境，就像这风雨中的黄昏，一片灰暗。

在“经过了9家小酒馆和3所教堂”后，拉贝终于来到靠近海滨大道尽头的大海旅社，此时已被淋成“落汤鸡”。

随后，拉贝联系了安茨公司老板布瑟先生，布瑟是西门子公司在烟台的代理，也是拉贝的老朋友，1919年曾与拉贝一同被遣返回国。

这里面有个插曲。“一战”期间，北洋政府对德宣战，1919年，拉贝被遣返回国，但第二年，他又回来了，又以某中国外资公司高级顾问的名义，继续为西门子子公司工作。政府怀疑他目的不纯，对他进行监视。直到国民政府在南京扎根，并认可了西门子公司在华权益后，他才告别了“黑名单”，不再是“形迹特殊的人”。

在烟台，拉贝度过了短暂的愉快时光。让拉贝高兴的是，布瑟的女儿刚从南京返回，带回了南京的消息。

但她带来的消息却是不妙的：南京在8月中旬就受到了猛烈轰炸，居民们都在纷纷逃离。此外，烟台的周围地区遭到了水灾。乘机动车辆到胶济铁路去是不可取的，因为布瑟小姐乘坐的汽车途中就不得不多次停下来，全部乘客被迫下车，车子才重新发动起来。

后来，布瑟帮忙搞到一张去青岛的船票。那艘轮船同样挤满了中国难民。由于青岛和上海是战区，众多难民涌向暂时无虞的青岛。同拉贝一样，再转道胶济铁路西逃。

抵达青岛后，拉贝拜访友人，漫步青岛，“为的是再看一看那些曾经属于德国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了日本人撤出的地方。”

对于青岛，对于日本，德国人心态挺复杂。青岛是二十世纪初德国倾力打造的“模范殖民地”，投入巨资进行建设。青岛也是德国的伤心之地，在1914年日德青岛战争中，被日本打得落荒而逃。

胶济沿线 满目凄凉

尽管战事还没有波及胶济线，但铁路沿线的景象让拉贝倍感凄凉：

“胶济铁路两边远远近近的村庄和田地都被水淹了，有些居民蹲坐在自家倒塌房屋的梁木上。只要火车一停下来，乞讨民众的凄惨的哀叫声就从各个窗口传进来。”

原来，同年8月，济南“长清玉符河决口，大水向东淹没济南百余里之村庄，受难灾民达十余万人。”后又“因黄河决口，被淹区域达八九县之多”。（《民国山东铁道暨世界红十字社会史事钩沉》，李光伟，载《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一期）

到济南后，拉贝住进石泰岩旅馆，石泰岩旅馆是由德国人石泰岩在1904年创办的，位于胶济车站南侧的大马路（今经一路）。前后两个院，前院是二层楼房，后院是平房，总共有五六十间房屋，旅馆有50张床位。



□ 张勇

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一位政治上守旧而学术上富有造诣，堪称近代音韵学家和数学家的人物，他还是中国拼音运动史上正确解决方音与共同语关系问题的第一人。在政治上，他官至大清国的学部副大臣（教育部副部长），誓死捍卫清朝政权，思想保守，曾写信给袁世凯劝他将帝位还给清室，还想过为保住清朝统治让溥仪娶个德国妻子。这个集保守与开明于一身的矛盾体，便是祖籍阳信的清末著名数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劳乃宣，被世人称为一代饱学之士。

凭文才进入吏部

据《清史稿》记载，劳乃宣担任县令时，每天清晨即起，然后升坐二堂，向衙役们交代完当天的任务后，再升大堂接受诉讼。只要有人来告状，就随时升堂办理，并下令“役吏不能隔民”，也就是说百姓的诉状都要交到他手，一过一日，并亲笔进行回复，办理案件日理日清，从不拖延积压。据史料记载，在其任县令期间，还曾三次在上级的考核中被评为“卓异”。

1899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并迅速呈现燎原之势。劳乃宣撰写了《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表示经过考证义和团是邪教白莲教的支流，源于八卦教中的离卦教，早在嘉庆年间就被明令禁止。劳乃宣不仅将这份考察结果在其任职上进行大规模宣传，呼吁百姓不要参与，同时也呈送朝廷，申请将结果全国颁布，以禁止义和团运动。

虽然慈禧太后最终决定利用义和团对付洋人，对其采取了怀柔政策，劳乃宣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并没有推广到全国，但他的学识却被朝廷看到了。1900年，劳乃宣终于离开县令的岗位，被调入京，任吏部稽勋司的主事。可官没安稳当几天，义和团的势力也进京了，与拳民们正面打过交道的劳乃宣深知“大乱将作”，于是“请急南归”，于1901年10月任浙江求是大学堂（浙江大学

齐鲁名士

一位政治上守旧而学术上富有造诣，堪称近代音韵学家和数学家，同时又誓死捍卫清朝政权，力主复辟清朝，也曾是中国三所名牌大学的校长……

劳乃宣：集保守与开明一身的学问大家

前身)总理(校长)。

劳乃宣的主张虽然没有被清政府认可，却得到了袁世凯的肯定。文史学者丁志可，在《劳乃宣：左手学者，右手官吏》中就曾写道：“1899年，袁世凯赴任山东巡抚的路上遇到了劳乃宣。劳乃宣把自己对义和团的考证书拿给袁世凯，得到了袁世凯的首肯。袁到山东以后，建议清政府对义和团严加预防。他自己则痛下杀手，使山东义和团死伤惨重。对于袁世凯镇压义和团的行动，劳乃宣鼓掌叫好。六年后，他在与徐世昌谈到这个问题时，还称赞袁世凯：‘山东能保全，全在他，令人感佩。项城(袁世凯)用我之言而收效，至今犹未忘。’”

首位汉语拼音倡导者

劳乃宣先后在上海的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当了三个月的监督(相当于校长)，后在杭州求是大学堂当监督两年多，在1911年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总理(校长)。近百年来，其一人先后做了中国三所名牌大学的校长，可谓是个奇迹。在任学部侍郎兼京师大学堂总理时，他极力提倡中国语言的统一，主张以北京话为基础，全国通用；他主张汉字简化、拼音化，认为这样有助于教育的普及，受教育的人多，国家才能富强。

1883年劳乃宣出版《等韵一得》一书，这是清代最晚出的等韵学著作，也是清末唯一的一本等韵学著作。《等韵一得》属南派系统。全书分内外篇，内篇以四声、韵母、四声为三个纲，包括字外谱、韵摄谱、四声谱等10谱；外篇包括字音、韵谱、四声、双声叠韵、反切、射字、读法、杂论等8个内容。该书条理清晰分明，审查精细，分类多合现代音理。在等韵学研究中有一定成就。他是汉语拼音文字的创始人。1905年，劳乃宣为了弥补王照所提倡的官话合声字母只能拼写北方话的不足而在其基础上增加了6个声母、3个韵母和一个人声符号，以拼写下江官话，这就是宁音谱(后以《增订合声简字谱》为名在南京出版单行本)。在此基础上再增加7个声母、3个韵母、一个浊音符号，以拼写吴音，这就是吴音谱(后以《重订合声简字谱》为名在南京出版单行本)。在吴音谱基础上再增加20个声母、2个韵母，制成闽广音谱(未出单行本)。1907年出版的《京音简字谱》阐述了王照的官话字母，同年出版的《简字全谱》(一种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则包括了京音、宁音、吴语和闽广音四谱。1908年5月，应召入京，于颐和园晋见慈禧太后，向慈禧太后建议简化汉字并推广汉语拼音文字，他进呈的《简字谱录》也得到御批，让“学部议奏”。1909年，劳乃宣与赵炳麟、汪荣宝等一班名流，在北京成立了研究文字

改革的最早的群众性团体之一“简字研究会”。他的合声简字在南方得到广泛传播，从而使他成为中国拼音运动史上正确解决方音与共同语关系问题的第一人。1913年，“读音统一会”制定注音字母时，多采其说，从此，汉语拼音逐渐在我国推广开来。其编写的汉字拼音方案，鲁迅曾称赞说“先进得很”。当时政府以劳乃宣、王照的两个方案编成了“注音字母”，在我国流行通用了几十年，字、词典以其注音。新中国成立后，编制的《汉语拼音字母方案》也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忠诚而守旧的捍卫者

1899年义和团运动遍及全国，时任河北吴桥县令的劳乃宣奉清廷之命尽力镇压。从清朝科举中走出来的劳乃宣，始终笃信能依靠大清王朝的余威，并以清朝遗老自居。

在清末法务大臣沈家本为主修订《大清新刑律》时，以劳乃宣、张之洞的“礼教派”与沈家本的“法理派”进行了激烈争斗。劳乃宣认为外国之俗重平等，而中国之俗重伦常，凡是那些旧律中与平等原则不符合的却是中国伦理，法律应尊重伦理。“山中甲子今何日，醉读《离骚》独问天。”劳乃宣这两句诗，正反映了他在所处历史年代中，对大清王朝内忧外患、国势衰颓的叹息，以绝学之身事忠报效的殷切。在他看来，国之大变局，无非与历代王朝的分化危机一般，“自有生民以来，无日非创局而已，岂料今日而然哉！”

民国成立后，他志存复辟。在辛亥年冬天作了《共和正解》。在劳乃宣的解释中，共和是周宣王因太子年幼，不能执政，乃由朝中重要的公卿“和”与“共”修政事，所以名曰共和，宣极力兜售他的理论：共和乃君主政体而非民主政体，将民主加进共和，是“不学无术”。

劳乃宣上下频繁活动，为王朝复辟鞍前马后，冲锋陷阵。

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光绪和隆裕奉安时，在灵棚中，刚当上袁政府外交总长的孙宝琦，身穿礼服进来时，劳乃宣与另一孤臣梁鼎芬，一唱一和，大庭广众之下大骂孙忘了清宗规矩，竟穿礼服来见先帝身后，没有廉耻。

为策划复辟，劳乃宣甚至组织遗老遗少成立社团“十老会”，但最终不能挽救大清的命运。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当一切终为定局时，劳乃宣选择了与她姓“劳”同音的崂山隐居。他把再无法实现的政治企图，寄托在了自认为蕴含他血脉渊源的峻奇自然山水之上。“海色苍茫外，还疑别一村。窗虚山作画，林密树为门。宴坐时忘我，

据1927年《济南快览》记载：“德人石泰岩所设之旅馆，完全为西洋式，兼营餐馆及牛肉之贩卖，每日房金自八元至四元。旅济之西洋人多寓于此，盖得言语习惯之便利，中人鲜有人者。”

石泰岩与胶济铁路济南站颇有渊源。据1934年《济南大观》记载，车站大楼内的胶济铁路饭店，亦由石泰岩担任经理。因此，拉贝住在石泰岩旅馆，不论吃住，还是旅行，都方便得很。

拉贝在回到南京后，在日记中曾提及济南，不过不是饭店，而是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韩湘琳。

韩湘琳(1906年—20世纪80年代)，山东临淄县人，曾就读于齐鲁大学经济系。南京大屠杀亲历者，时任拉贝的秘书。拉贝对他评价甚高：

“我给了我的助手韩先生一笔预支款，使他能够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安全的济南去。他十分坦率地说您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如果您离开，我就跟您走！”(1937年9月21日日记)

“韩先生决心与我同甘共苦。这也是我对他唯一的期望。他是一个正直的人！”(1937年11月19日日记)

住在济南的拉贝肯定想不到，在他后来拯救的难民中，其中一个后来成为济南铁路局职工家属，她的名字叫徐淑珍。

1937年12月18日，南京大屠杀(12月13日)发生之后的第五天，18岁的徐淑珍随同母亲，还有20岁的姐姐徐淑德，以及两个只有十四五岁的弟弟，逃难到金陵大学附属中学难民收容所。这是拉贝所负责的国际救济机构下设的25个难民收容所之一。尽管当时收容所内人满为患，但看门老人见徐淑珍的母亲裹着脚，带着四个小孩很不容易，便好心收容了他们。

此后，徐淑珍和姐姐徐淑德在收容所内做义工。保留至今的“南京难民区国际救济委员会委员暨收容所所长率全体职员摄影纪念”照中，就有当时风华正茂的姐妹俩。

徐淑珍离开难民所后，到南京市卫生防疫站做实习生，后嫁给了薛惟城。1953年，徐淑珍随薛惟城到济南定居。薛惟城在济南铁路局防疫站工作。如今，徐淑珍已是96岁高龄，尽管记忆大不如前，但历史不会风化。

再说拉贝，在津浦铁路济南站，乘火车南下，顺利地到达浦口，再渡江到南京。这天，已经是9月7日了。而他从秦皇岛启程的时间是8月28日凌晨。

拉贝感慨良多：“和平时期坐火车只需40个小时的行程，可是这次我花了10天半时间。”

微弱烛光 划破黑暗

一到南京，拉贝就开始忙碌起来。当然，也处在极度危险当中。

“9月19日、20日在这两天里，我在4次空袭中受到了战斗洗礼。从这一天起开始了——我的



拉贝

战时日记在那些狂妄滥炸的日子里，我和我的中国人坐在一个自己设计建造的防空洞里，它虽然不是绝对安全，但可以保护不受榴霰弹的炮火和炮弹碎片的伤害。在院子里还撑起了一块长6米宽3米的帆布，我们在帆布上画了一面有卐字标记的德国国社党旗。”

“德国国社党”，即“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尽管纳粹党旗后来让许多人心生厌恶，可就是这面党旗让许多中国人免遭轰炸。因为二战时纳粹德国与日本是盟国。

“一些机灵鬼把他们的床安置在水平悬挂的德国纳粹党旗下面，那是为防日本飞机轰炸而备的，这个地方被看作，是‘防弹地带’”(拉贝1937年12月12日日记)

当然，拉贝领导的安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所保护的不仅是这些人，还有更多更多的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善举，他是这样说的：

“由于我们委员会的绝大多数委员以前一直在这儿从事传教工作，他们一开始就把战争期间不离开自己的中国朋友视为自己基督徒的责任。我作为一个商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因为我30年来一直是在这个国家。在我如此长时间地享受到这个国家及其居民的深情好客之后，我也是从开始就认为，在他们遇到不幸时不抛弃他们是合适的。”

这就是促使我们这些外国人坚持留在这里，试图帮助遭受苦难的中国人的原因。这些人是中国人的中最贫穷者，要离开这个城市又没有钱，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

拉贝及其同仁身上所体现出的人性光辉，与灭绝人性屠杀中国人的日寇有着天壤之别。

1938年2月，拉贝应西门子总部要求，离开南京，返回德国。就在离开南京时，他又救助了一名中国工人，把躲在他家养伤的中国飞行员王光汉，扮作佣人安全带到了上海，又护送到香港。

拉贝回国后，先后通过作报告、播放纪录片、给希特勒写信等方式，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但当局强令他保持沉默。

“二战”结束后，拉贝又因为纳粹身份，先被苏联人逮捕审问，后被英国人抓去审问。在证实没有犯错之后才被释放。

“今天，约翰·拉贝已被视为兵连祸结之中的弥赛亚(注：救世主)。是他的出现改变了无数人的历史，也是他给了那段历史微弱的烛光，使它并非绝对意义上的漆黑一片。”(《约翰·拉贝画传》序言)